

《大变法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大变法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08176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08173

出版时间：1996-04

出版社：三联书店

作者：叶坦

页数：2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作者简介

作者介绍

叶坦，女，1956年10月生于北京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经济学博士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，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、宋史、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等研究。主要著述有：《富国富民论——立足于宋代的考察》、《传统经济观大论争——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》、《民族与文化——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》（合著）等。

《大变法》

书籍目录

《大变法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本书认为神宗才是熙宁变法的真正主角，他的通过变法强化了君主专制独裁，改变了此前相对的君臣权力制衡，断绝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权力制衡的可能，为明清走向君主专制的顶峰打开了闸门，见解独到。可惜由于作者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知识素养不够，没有写好。
- 2、大学着迷历史时读的，本来希望是部类似《万历十五年》那样的上乘之作，结果读下来有些失望，关于王安石新政的实质始终不是很明白，可惜。
- 3、以經濟史家的視點來解讀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，作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社會進程中的一大轉捩點，王安石是歷史的功臣還是罪臣，全因此而起
- 4、神宗变法
- 5、中国改革过程种各种角色的博弈。摈弃了粗暴地对“变法”与“反变法”的派系分类。
- 6、无需多言
- 7、国家主义的失败
- 8、想以此了解《新宋》和历史的不同
- 9、b
- 10、流入浅显、俗套之中，感觉没有说到要点。宋神宗与王安石主导的变法，目的与动机无非是政权的国家主义与治权的专制主义，在治理结构与权力运作中缺乏政治制衡与政治透明，又兼整个社会未能形成共识，国民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没有建立起来的古代社会中，这种个人理想主义情怀的改革必定是瞎折腾。
- 11、王安石的改革一是因为破坏了国家信贷与民间信贷之间的“分离均衡”，没有认识到国家信贷与民间信贷根本不是互补或者替代的；其次因其缺乏改革需要的行政才能；又个人生活奢侈。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政见的对立，对后世思想史有着深刻的影响
- 12、忠臣的斗争
- 13、把王安石和宋神宗写的基情四射我会随便说出去么。其实最感动的还是文人风骨，苏轼王安石会于金陵的那一刻，真是一种怎样的会面啊。历史是残忍的批判，即使王安石和宋神宗励精图治地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反而推后了历史的进步，不得不感叹，可惜这一位有为的君主。

1、本书见解独到。作者认为神宗才是熙宁变法的真正主角。神宗通过变法强化了君主集权，扫清了他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。此举历史影响巨大，其打破了宋初开创的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君臣权力之间的制衡，从此君权日益专制，再无可限制。可以说这是一次历史的分水岭，熙宁变法断绝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权力制衡的可能，而只能向君主专制独裁之路上愈走愈远，直至明清走向君主专制的顶峰。只可惜由于作者出身经济学，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知识素养积淀又不足，难以驾驭如此宏大的政治历史命题。因此，本书尽管观点新颖，却没有写好。

2、用了一天半时间看完了关于宋神宗朝《大变法》这本书，也就是被列宁同志赞誉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”的王安石的主导的大变法，此书作者叶坦系经济学博士，相对来讲，对改革成败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的，不是从政治思想史；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在今天才能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其原因。读完此书才发现，王安石实在缺乏改革需要的行政才能！我们知道，宋太祖赵匡胤创建的新的政治秩序是在吸取了五代十国混战局面后，为了加强皇权他采取了通过官衙设置和人事调配来实现的，也就是“分化事权”和“互相牵制”为其特征。在中央，设置了政事堂和枢密院“对掌大权”，结果是三省，六部，九寺，五监等旧机构名存实亡，成为闲散机构。宋朝的这个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机构重叠，人浮于事，互相推诿，最主要的是文官地位提高以及军队的软弱，从原来的儒家一直倡导的文治武功到宋朝完全崇尚文治，对中国军事来说有决定性影响。文官地位提高就表现的唐宋八大家里宋朝就占了六家，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推行，宋朝军队的软弱是历朝所没有的，在宋太祖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到靖康耻辱，宋朝在战略上一一直处于守势，也就是采取财富换和平的投降策略。到了宋神宗时代，体制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，这个危机首先表现为财政上，以至宋太宗承认当时的税赋是唐朝的两倍，到北宋后期，林勋认为税赋已经是唐朝的七倍多了，连朱熹也认为宋朝把古时候刻剥下民之法都用到了。为之王安石的变法随着历史的需要出现了。当时宋朝的财政危机就表现在三冗和两积上，三冗就是“冗官，冗兵，冗费”，两积就是“积贫，积弱”。王安石作为变法派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，司马光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措施的一方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其实他们两个人都主张变法的，但出发点不一样，采取的政策也不一样，王安石主张从提高管理水平来解决这个危机，也就是扩大税源来解决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；司马光是主张首先裁减冗员，冗费，开源节流，提高效率来解决问题，可以说，司马光的改革有从机构改革着手的意义。从预期预计实际的效果来看，变法是失败的，因为他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结果这个危机，相反加重了广大百姓的负担，使得广大百姓怨声载道，而且商人，富人，地主都反对他，包括朝中的主流官员也大多反对，所以他的改革显得孤军作战。这次失败用现代经济学很容易解释，那就是政府代替市场功能的时候，理论与实际效果往往是相反的。从现代经济学来看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小农经济，主导此经济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，相反是“生存伦理”，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！此伦理决定的生存经济自开始不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小农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的均衡，而不是利润与成本之间的比较！在制度方面，小农经济发展既非集体化，也非市场化，属于一种小型合作化，不算彻底的资本主义精神下的市场行为。由于我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是生存经济，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此为“生存经济”，那么与生存经济配套的信贷制度就是带有救助性，而不是商业性的；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是救助性质的农村宗族的“义仓”就是最直接的明证。在著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学者黄宗智看来，中国的小农经济应该用这个等式来描画：小农收入=家庭农业收入+非农收入。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普通的等式，如果与黄先生的“拐杖逻辑”结合起来理解，就会发现这个等式就不一般了。这个逻辑说的是小农收入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家庭农业收入，非农收入是拐杖。自西汉确立了中国的农耕方式后，这个等式就就一直一直没有实质的变化。中国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不存在解雇剩余劳力的空间，那就意味着单位土地上随着人口增长只会导致人口的过密化，过密化越发展那么非农收入的拐杖功能就越加强。由于小农经济本具有“内源融资”的偏好，即“不轻言债”，加上中国是个乡土中国，宗族内部的互助对市场交易行为的替代功能以及熟人社会，决定了农业信贷要么来自国家要么就来自友人，因此信贷要么高息要么无息。我们国家相对西方的三元结构来，属于二元机构，那就是国家与百姓之间直接打交道！西方则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存在，这个中间地带就是“市场结构、法律结构、和产权结构”，有什么事情，百姓一般都通过中间结构来解决，农户与国家是间接的关系，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，国家与农户是直接的关系。王安石的变法则加重了两极结构，那就是让国家代替民间的融资做法，取代市场，想把民间高利贷让国家的商业行为挤出去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利率竟然高达40%，最终加剧了农民的负担

《大变法》

。原因就在于国家农贷制度有一个悖论：要么均摊，要么就是最不需要钱的人最能贷到钱。在书中我还看到的王安石真是一个只有文采缺乏行政经验的人：首先心胸狭小，没有器量，容不下别人的意见，所谓“狷狭少容”；其次任人唯亲，主要体现为只要支持他的变法就提拔，而提拔的这些人的品行实在很差，王安石就因为邓绾上书称颂新法，王安石就提拔了当了谏官，而此人为了升官，到了无耻的地步，别人讥笑他的时候竟然说“笑骂从汝，好官须我为之”，以至曾布说新法用人“不问疏远，识与不识，即日招用，诚近世所无也”。司马光深刻的看到王安石的变法，不仅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，因为他的变法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和平均赋税，开源节流着手的，相反只会增加百姓负担，还有就是司马光反对政府控制市场，因为这样不利于市场的交易，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导致了连果子的交易都被国家所控制了。最后在司马光恢复相位的时候，回到京城的时候，“天下之人日冀复用于朝”。一进城门，守卫则“皆以手加额曰‘此司马相公也！’”民遮道呼曰“公无归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”。还有许多书籍记载司马光入城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：人们踮足翘首，围聚遮道，以至司马光所骑之马都没有办法行走了。司马光的确饱享盛名，他有着古代社会中为人尊崇的个人品质-----俭朴，廉洁，博学，持重，重名节，讲礼仪，行忠信。他历仕四朝，“皆为人主所敬”，使得王安石不得不说“行义行于朝廷，文学称于天下”。司马光死后则是高后为之辍朝发丧；百姓为他罢市致奠，如哭双亲，千里不绝。孙固则认为王安石“为问甚优”，为相则“狷狭少容”。王安石的改革一是因为破坏了国家信贷与民间信贷之间的“分离均衡”，没有认识到国家信贷与民间信贷根本不是互补或者替代的；其次因其缺乏改革需要的行政才能；又个人生活奢侈。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政见的对立，对后世思想史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《大变法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